



美丽的肃北草原 我的天堂

杨克俭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美丽的肃北草原 我的天堂

杨克俭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美丽的肃北草原,我的天堂

作 者:杨克俭

责任编辑:蔡 曼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天津出版大厦 7-8 层

电话:022-23332656

印 张:16.375

印 数:1-5000

版 次: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3-9701-3552-2

定 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 言

我在肃北县工作了四十多年，对肃北的山川河流，一草一木，只砖片瓦，都有着深厚的感情；对肃北的牧民、同事、朋友，无时不在思念。由于年事已高，恨不能一一相见。

二〇一〇十月份，肃北县老干局组织退休老干部去港、澳旅游，我被批准成为其中的一员。有幸见到部分老同事、老朋友，还有我教过的学生，满足了我部分心愿，这使我无比高兴。

俗话说：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。这虽说是思乡情怀的写照，但没有对家乡深切的思念的情怀，是无法体会到它深刻的内涵的。

多年不见，突然见到就觉得无比的亲切，相见恨晚，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。

老朋友相见，似乎有说不完的心里话。寒暄问候自不必说；简短地回忆也是必然的话题；未能相见的老友的近况，自然是关心的对象。

窦步清同志是我刚到肃北县就一起工作直到退休的蒙古族老同志，是我的老朋友、老相识、老邻居、老知己，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。多年不见格外亲切。一番嘘寒问暖后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你应当写本书”。这使我非常意外，非常惊讶。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写什么书。凭我的水平，正如小品剧《小崔说事》中赵本山说的：“一个礼拜憋出六个字来，还写什么书？”我心里在暗想：“我能写什么？”我把我想的对他说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写你自己呀！”。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有点被“嘲弄”的感觉，辩解说：“我这辈子平平庸庸，庸庸碌碌，可以说是苟且偷生了一辈子，根本没有任何值得写或者可以写的东西”。他有点毛躁了，说：“你咋么就看不到自己的价值、看不到成绩、看不到自己的能力呢？现在没时间细谈，等我们回来时在火车上再慢慢的细说。”

我虽然还不能理解他的意思，但也只能这样，只好等回程时再聆听他的

教诲了。

一路上玩的很开心。

我们在一起游山玩水，拍照留影。我还用家用录像机记录下了行程中的一些有趣的画面，如广州的公园、深圳的市容、香港的海滩、澳门的古迹。还有那赌场气势、海底风光、船坞码头，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大开眼界。

八天的游玩让我们特别舒心。良辰美景，无限风光，目不暇接。虽意犹未尽，但已走完了行程，只得遗憾地踏上了归途。

回程时，我们乘坐的是火车，要一天多将近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兰州。上车后我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铺位。多天的旅游行程让大家都有些疲惫，只想好好休息。我刚躺下不久，窦老师来了。我请他坐下，表示欢迎，客套一番，谈了些往事后便转入正题。他问我：“写东西的事，想得怎么样了？”我对他刚见面时说的话并未放在心上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写不出什么东西来。我说：“我真不知道写什么，该咋写”。这下可打开了老朋友的话匣子。他从我初到肃北一直谈到了退休。列举了我在各个阶段、各个时期、调往各单位所做工作的具体事例。最后总结了两句话：“你是金子，放在哪里都发光。哪个单位需要你，你就在哪个单位出现。”还说：“你是真正为肃北县人民服务的好干部。”

我觉得他这个人看问题总让人有一种独辟蹊径的感觉。别人看来平平淡淡的東西，在他眼里可以看出“天经地义”来。在别人心里无所谓的东西，从他口里说出，就觉得很有道理，很有韵味。对问题分析起来头头是道、一



鼓励我写书的蒙古族教师窦步清同志

(2010年香港 左一为作者)

针见血、恰到好处，而且非常形象，不得不让人心悦诚服。这也许就是所说的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吧。

过高的评价，让我感到无地自容。所举的事例又给了我一定的启发和鼓励，增添了我不少勇气。

我感谢老朋友的深情厚意；佩服老朋友锲而不舍的精神。

不能辜负老朋友的一片好意，就凭朋友对我的理解、支持和鼓励，我也得决心动笔。同时我想，写我在肃北的点点滴滴，也将会反映出无数在肃北工作过的老干部、各行各业工作过的老同志，也包括那些老牧民，为了肃北的建设、祖国的繁荣，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，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朴素情操。这是我写书的动力来源。

我准备按照老朋友的思路，对我这一生，尤其在肃北工作的情况，作一个简单的回顾。

在这里，我对我的蒙古族老朋友窦步清的知遇之恩表示衷心的感谢。顺便也对鼓励我、支持我写书的子女、家人、亲朋好友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我把书名定为“美丽的肃北草原——我的天堂”。我觉得这最能表达我对肃北的热爱，最能表述我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吧。

天堂，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美好的地方。在相当一部份人的想象中，那里是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、无病无灾、无生活的烦恼、无病痛折磨、无尔虞我诈、无等级森严，那里是平等、和谐、美满、幸福生活的理想的乐园；也有一些人把它想象成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、鼓乐欢歌、灯红酒绿、无所是事的仙境，并且认定，只有那些修成正果、修炼成仙的人，死后才能到达的地方。这只不过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而杜撰出来的遥不可及、虚无缥缈的幻景。

人们热爱家乡，赞美家乡，把家乡比作天堂，是一种愿望，是一种理想，也只是一种比喻罢了。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常常把家乡比天堂，如洪湖赤卫队插曲中唱的：“人人都说天堂美，怎比我洪湖鱼米香……。”形容家乡赛天堂等。我喜欢的还是那与我生活最贴近的、与我心相印的腾格尔的那首歌，特别是那句：“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……。”我所以感到亲切贴心大概是因为他是蒙古人，唱的又是草原吧。

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，歌词中那“蓝蓝的天空、清清的湖水、碧绿的草原、雪白的羊群、还有那姑娘……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！”勾起我对家乡美景的陶醉。这不正是我的家乡美景的写照吗？不！我的家乡比这更美。巍峨的雪山、奔腾的党河、幽静而神秘的峡谷；历史悠久的人文古迹、无尽的宝藏——金矿、煤矿、重晶石矿等等；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——野驴、野马、野骆驼、青羊、黄羊、大头羊；还有那珍贵的药用动植物：雪鸡、雪莲等。这些美景和资源在歌词里是没有的。

同时，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艰苦奋斗下，矿山得到了开发，资源得到了利用；党河上建起了无数个水力发电站；狩猎场吸引了不少国外游客前来打猎；“孟克冰川”也已对游客开放。

如此美的家乡，作为曾经参加过建设的一员，真为之欢欣鼓舞，为之自豪、骄傲。不能不让人放声歌唱、不能不让人放声呐喊：“美丽的肃北草原，我的天堂！”

我把家乡比天堂，不只是我对家乡那美丽山川的赞美，更重要的是它哺育了我的一家，托起了我们美好幸福的生活。这片土地有恩于我，我对这片土地，感情最深厚、最迷恋、最热爱。

目
录

前言	(1)
我的童年	(1)
罗曼蒂克进行曲	(21)
我的老师	(38)
放 逐	(41)
拜 年	(46)
我爱上了民族教育事业	(49)
反“右”派和反封建运动	(53)
三面红旗	(61)
粮 荒	(65)
我喜欢学生多	(68)
得心应手的底气	(71)
试验班	(77)
水与火的记忆	(80)
我经历过的“文化大革命”	(87)
教育普查	(107)
扎扣文老人是我“杀害”的	(113)
值得我学习和钦佩的人	(118)
补划成分	(124)

毛泽东思想宣传队	(127)
重返教育战线	(131)
弃“教”从“文”	(139)
我爱上了乌兰牧骑	(143)
倾 力	(146)
鼎盛时期	(151)
和石油工人在一起	(156)
参加比赛	(158)
边防慰问	(161)
和牧民在一起	(164)
感 谢	(184)
文化馆工作	(189)
二进宫	(195)
党 史 办	(199)
我们的好书记——拉希尼玛同志	(200)
广播站	(209)
奔走精神文明办	(217)
余 热	(223)
久别重逢	(226)
我的家人	(233)
重游故里	(247)
后 记	(254)

我的童年

童年时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奠定了我的人生观、价值观以及人生道路、人生轨迹的基础——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。

我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。

一九三八年，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，我降生在一个可以算得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中。

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可怕的、残酷的战争传说中度过的。虽身居西北大地，未经受那战乱之苦，但从大人们那里也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惧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常听大人们讲述那些日本鬼子惨无人道、兽行肆虐，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故事。

大人们所讲到的鬼子残害中国人民的故事很多，最让我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日本鬼子把小孩挑在刺刀上，小孩还在哭叫，鬼子却在哈哈大笑的一些个讲述。留给我恐怖记忆的还有那经常和大人们一起躲避空袭的可怕场景。警报器响起，大人们就带我们一起去钻防空洞。在防空洞里，大人们讲起日本飞机在其他地方轰炸的情景，也是特别令人毛骨悚然。所以，虽然每次防空都没见到飞机，但仍然有点胆战心惊。我们屏住呼吸，生怕敌机听到我们的声音扔下炸弹来。从那时起，我幼小的心灵就留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刻骨的仇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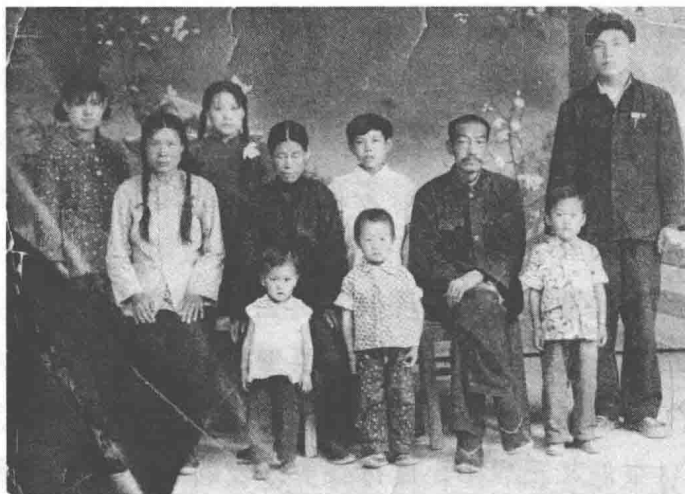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童年也和大多数人的童年一样，是在调皮、淘气、不安分守己，不循规蹈矩中度过的。同时也是在改朝换代的苍桑岁月中度过的。

父亲是个山西商人。祖籍在山西忻州孙村。他从小就没有了父母，是姐姐把他拉扯大的。他有一个弟弟，从他离开家就失去了联系。姑妈在父亲离开山西前就嫁给了山西忻州孙村的一家我记得好像姓“智”的人家。我们常听父亲说起，但从未见过面。我没听说过他在是什么时候、多大岁数就离家到玉门的，也没听说过他艰辛的创业过程，我想象得出他的流浪创业经历

一定是非常艰难而心酸的。

在我还没出生之前，父亲就在玉门一带收购甘草。在玉门一带很有名，人们称他“杨甘草”。

父亲名叫杨烈英，字子杰。由于他常年累月在玉门一带收购甘草，除了一些亲朋好友，街坊邻居和生意伙伴外，谁也不知



我与父母兄弟姊妹（1957年 玉门 后排右一为作者）

道他的名字，大家在背后都叫他“杨甘草”。所以“杨甘草”就成了他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的号了。

他把从玉门一带收购的甘草，在达到一定数量时，雇用人家的骆驼，驮到张家口去卖。然后，再买上日用百货运回玉门来。这样一来一去，听说大约需要一年多的时间。

他出去收购甘草，没有高头大马，总是骑一头大叫驴。这头驴，比当地的毛驴大，虽没有高头大马那么威风，但看上去也还有点威武。个头大，毛色好，高高跷起的头上，竖起两只又长又大的耳朵，总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，再配上那鲨鱼皮的雕花鞍子，姿态也还比较神气。

父亲上驴时总要穿一件长袍，戴一顶礼帽，提着那根藤条“马棒”。虽然没有骑着高头大马那样显赫，也还有那么一丁点的气派。

这头驴好像懂得自己的身份，每到一处，都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。离村庄还有几百米的地方，就开始引颈高歌。嗷嗷的叫声，能传出几里外，好像在告诉村民：“我来了！杨甘草来了！快把甘草准备好！”

父亲年轻时脾气很暴躁，经常不知为什么就大发雷霆。发起火来，屋里的锅，碗，盆，瓢都会在空中飞舞。每次发过脾气，都要睡上几天。

当时我是家中最受宠的一个。父亲从未打过我。母亲和姐姐也都捧着我，因此，在家里我也就很有些霸道。记得一次姐姐不知怎么惹了我，我随手拣起一块砖头就砸在了姐姐的脚上，害得姐姐好多天都无法走路。对此，

父母姐姐都没有怎么责怪我。所以，我就成了母亲向父亲求情赔罪的使者。每当父亲睡着不起的时候，母亲就会叫我去，跪在父亲的床头前，说一番母亲教给我的话。这招还真灵。父亲的气不久就会烟消云散。当时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软弱，受了气，还向父亲赔罪。现在我懂了，那是母亲对父亲的尊重和爱戴。

父亲是一个很会动脑筋，很能干的人，甚么事情都难不倒他。有甚么困难，只要他一动脑子，准能想出办法来。就连厨艺，他都是一把好手。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家境还比较富裕，每到春节前夕，父亲都要带领全家，准备过年的吃食和各种凉菜拼盘的材料，如粉蒸肉、丸子、夹沙、卤肉等等。过年的时候，只要稍加动手，就会拼凑出一桌丰盛的酒宴。来拜年的亲戚、朋友，都会享受到父亲准备的美味佳肴。

我不知道父亲是自学，还是拜师求艺。在我知事的时候，他就是一名中医。家里那些难懂得文言文的医书，到处都是。

在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，家境已不如前。记得我们家有一个药铺，父亲就是坐堂医生。我在节假日，都帮父亲为患者抓药，懂得了一些个药材名称、炮制方法和取药的规则。

解放后，父亲常常被征用去下乡防疫和接种。我不知道是征用还是雇佣，我估计应该还有点报酬，因为他让我到乡下讨要过粮食，说是下乡时农民欠的费用。我估计那一定是下乡时的报酬。

那是一个春天，父亲要我去离县城三十里外的乡下一家农民家讨要欠下的粮食，我记得大约是四十斤小麦。我去了，发现那家人家连饭都吃不饱，就连招待我的饭食，都是菜多米少的干菜黄米汤。看样子，他们是在靠干菜勉强度日的。饭后，我甚么都没说就离开了，再没提要粮食的事。回来后，我给父亲汇报了此事，父亲只说了一句：“那就算了”。看来父亲也和我一样，放弃了那些粮食。

后来父亲被吸收成了乡村卫生所的公职医生。

他所工作的地方，是当时玉门县二道沟乡的一个卫生所。卫生所设在一个以前的庙堂里。我多次去过那里。每次学校放假，我都要去那里看望父亲。记得那次我和妹妹杨克贞去看父亲，由于出发得太迟了，离卫生所还有

一段路，天就黑了。真所谓伸手不见五指，看不见任何参照物。我心慌了，难道就在这里转一个晚上吗？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发现脚下的路还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得见。幸好我还记得路边的一些特征和一些个参照物。我紧盯着路边的每个细节，像寻找丢失的东西一样，摸索着前进。经过了很长时间摸索，最后，总算找到了去向父亲的卫生所的那个路口，我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到了卫生所，父亲也为我们庆幸。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去那里看望父亲了。

一九五七年，反右派斗争时，被同事和上级诬陷打成了“坏分子。”这时我也去了肃北。[关于此事，我在后面还要谈到]

母亲是从金塔逃荒到玉门的农民。她的亲戚都很穷。听说大舅、二舅都是逃荒过程中不幸夭折的。大舅还留下一个傻儿子，一直在我家生活。一天不知为甚么，就突然不见了。大人们找了很长时间，都没找到，不知是死是活。三舅四舅在我家打过一段时间的工，以后也各自到别处谋生去了。三舅去二道沟乡，开了点荒地，和一个带有孩子的寡妇成了家，但是也过得有上顿没下顿的。四舅去“下东号”乡一个木匠家当学徒，后来学徒期满，和这家的女儿结了婚。解放后还当上了生产队长。

外公的情况没有听大人说起过，可能在逃荒前就已经去世了。

我见过外婆。外婆的生活也过得非常艰难。记得一次我去看她，她就住在一个别人抛弃的院墙内，用树枝和茅草搭起的小房子里。那根本不是什么房子，就是一个树枝搭起的窝棚。我不知她是咋生活的。大概是靠乡亲们的接济和儿女送去的一点粮食和着野菜过日子吧。

外婆有时也来看我们，她来时总是带着一点煎饼。我喜欢吃外婆做的煎饼。以后想起来觉得太为难外婆了，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来看我们还要拿东西。

外婆去世后，我去送过外婆。大人交给了我一个纸幡，听说叫“引魂幡”。我打着那个“引魂幡”走在棺木前面，棺木后面跟了好些人，有哭的，也有喊的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灵柩走一阵儿就要歇一会。我觉得好像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到了坟地。我为能送外婆一程感到欣慰。

两个姨妈一个去了新疆。一个就在附近叫下东号的农村。由于子女多，日子也过得很艰难。

下东号我常去。那里大概是父亲起家的地方。在我记事的时候，那里还有我们一家铺面，设在一个亲戚的场院内。由于家境的逐步败落，不久就撤销了。周围有三家比较富裕的农民，据说都是我们家的亲戚。我觉得说是亲戚，倒不如说是朋友，因为根本扯不上甚么亲戚关系。只有一家，是我的干爹，姓高，叫高文斗，家境比较好。他们有一些土地，还有一群羊。内外两个院子。内院是主人住的四合院。高高的院墙，靠南面的两个院墙角上还有像炮楼一样的小房子，据说是用来防贼的。院内的房子也比较讲究，有上房、东西书房、“倒座”[是门洞两旁的房子，面对着上房，当地人叫“倒座”]，还有伙房和库房。街门外面就是常说得场院，是长工住的地方。还有牲口棚圈和放农具的库房以及车棚之类的设施。

几乎是每年夏天我都到这里来住一段时间。这里有我的义兄，叫高著光，他比我大一两岁。我们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，玩得可开心了。我在这里就像在家一样。大人们都宠着我，兄长护着我，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田里的瓜、树上的水果。使我特别有记忆的是有一棵沙枣树上的沙枣，只有豌豆那么大，但非常甜，甜得像糖块似的，非常好吃。

姨妈离这儿不远。家里很穷，只有一间草房，炕上连铺盖都没有。我在他们家住过一个晚上，就睡在草席上，第二天起来，身上都是草席印子。

母亲是个很善良的人。她不仅对我们关怀备至，对父亲百依百顺，对伙计们也从不拿架子。不但不克扣工钱和吃食，还经常关心他们的病痛和温饱。所以，在我家没落的时候，以前的伙计们还常来看望母亲。口里虽然称作掌柜家，但行动上却如同亲姊妹一样的亲热。她对周围的穷人，或者有困难的人也是经常给以照顾和接济。在这里，我想起一件一直留在脑海里忘不了的事。这件事可能与我到肃北后的感情有瓜葛，所以一直记在心上。这事在好客的肃北蒙古族牧民中可能是平常的不值一提的事，可在人口集中的城镇，却是不多见的。

一个寒冷的冬天，从南山来了一个蒙古族牧民，在我们铺子里换了一些日用品。母亲见他怕冷的样子，就觉得他一定是又冻又饿，便留他在家里烤

火吃饭。他的骆驼拴在我家的街门口。一开始，是爬着的，头对着我家的街门。吃完饭，我们出来送这位牧民，不知什么时候骆驼却站了起来，头在街门内，身子却留在了门外。长长的弯脖子，卡在门头下，进不来也出不去。骆驼总是想把头拿出去，可怎么也拿不出去。后来，牧民让骆驼重新卧倒，起的时候把头拉在一边，才算把头取了出来。当时我年纪小，又是第一次见到骆驼，觉得好奇，特好玩，所以一直留在脑子里。也一直为母亲那善良和肯为别人着想的爱心所感染。

我有六个兄弟姐妹。

大哥，杨克勤，刚解放就参加了革命。党把他送到了革命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，就吸收为革命干部了。后来还进过人民大学。曾任酒泉专员工署检查署的秘书。

当时在我的眼里，哥哥很了不起，每次回来探亲，身上还带着小手枪，好不威风。那时还真让我为哥哥自豪了一阵子。

后来由于家庭问题，颓废、沉沦，由检察署秘书变成了监狱长，后来干脆被解职回了家。

大哥是解放前夕父母包办结的婚。临近解放的时候，由于国民党的反宣传，说共产党来了会共产共妻，因而掀起了一股结婚热潮。十四五岁的孩子都赶着结婚，大哥也被卷入了这一浪潮。原玉门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姓陈，叫什么我忘了，私下里人们都叫他“陈糟头”，大人们说他是玉门的八大头之一[八大头都是些贬义的绰号，像干头、肉头、糟头之类的叫法，也都是玉门的大地主]，是他托人登门为女儿提亲的。我父母也受当时思潮的影响，就希里糊涂的答应了，而且仓促的办了婚事。大哥工作后，因为她家成分不好，对大哥影响很大，因而提出离婚。我父母可能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坚决不同意。不知为什么，组织上也不支持。他就闹起了情绪，不好好工作。后来被派去当监狱长，更是情绪低落。以后不知犯了什么错，被解职回乡了。解职回乡后，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，又到新疆找了一份工作，好像也是秘书。据说干的还不错。干了不长一段时间，可能是发现他是被解职的，就又被辞退了。后来在新疆铁路上找了一份工作是翻砂工。可能是觉得他自己被大材小用，或者是由于怕苦怕累，不好好工作，拿着铁路上的免费乘车证

明，全国各地到处乱转。父亲不知他的情况，还认为他在那里干得很好，兴致勃勃的去他那个单位看他。到了那里才知道，他很长时间就不在单位了，人们都不知他去了那里。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，气得父亲好几天都没有吃下饭。就那样他在社会上流落了一段时间，把所有的证件都丢光了，无法回原单位，也无法再找别的工作，只好灰溜溜的回到玉门老家，老老实实的当农民去了。他生了三男、一女，男的分别叫杨继广、杨继洲、杨继成。原来都是玉门市玉门镇南门村的农民，现在可能是市民了吧。女孩叫春燕，嫁给了一个陕西农民，具体情况不太了解。

姐姐杨玉珍，也是在那时的结婚热潮中凑热闹结的婚。姐夫是败退过来的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连的文书。结婚后就留在了玉门。他手中有积蓄，就在玉门开了家铺面。由于不会经商，不久就倒闭了。可能是由于懊丧，整天倒在床上蒙头睡觉，还不时的行使家庭暴力，所以姐姐就和他离了婚。后来因为孩子的关系，就又重新复了婚。

姐姐是个很能干的人，这个家全是靠姐姐撑着。六零年粮食紧张时，她带着她的全家五口和我母亲及我两个弟妹去了新疆。母亲和我的弟弟妹妹三口留在了玛纳斯县，她们一家去了精河，都在农村种地为生。他们的一家还是靠姐姐的劳动维持着，姐夫还是经常睡觉。

说姐姐的能干，还表现另一件事上。

一九五七年反右派，父亲被打成了“坏分子”。姐夫也因当过国民党兵，被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。她始终觉得那是错误的，就和其他一些被误判人员的家属一起，靠讨饭、打工，去北京上访。历时八年，一次次的被迁返回来，又一次次的返回北京，她始终不肯放弃，终于为父亲和她丈夫平了反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她又回到了玉门。在玉门市开了一家旅馆，养活一家六口。这时她的三个孩子已经结婚，留在了新疆。由于一生劳累，六十出头，就撒手人寰了。她生有四个男孩，三个女孩。最大的是女孩叫田秀琴，另外两个女孩叫田秀丽和田秀梅。男孩分别叫田存新、田存胜、田存喜、田存庆。他们的排行我至今没有搞清楚。

我还有个妹妹叫杨克贞，初中毕业后就和几个同学去了新疆找工作。很

难想象，十几岁的小姑娘，离开了家是怎么生活的。由于家庭生活所迫，家里人也未阻拦。也还真行，她居然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后来她和有色金属矿的技术员叫吴海明的结了婚，生了两个孩子。不知为甚么，丈夫的单位整体搬去了云南。由于风湿病，在我退休后不久她就去世了。她生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。大女儿叫吴杨，二女儿叫吴静，儿子叫吴波。

母亲去新疆逃荒时，带着的弟、妹。弟弟叫杨克惠，妹妹叫杨玉玲。一九六二年我接母亲去肃北时，弟弟杨克惠正在机电学校上学，因为是全包，不花家里一分钱，就留在了那里，毕业后分配在乌鲁木齐工作。在那里娶妻生子。弟媳是当地的姑娘，叫王凤梅，特别能干，在我眼里她比男人还能干。改革开放前她是商业职工，改革开放后，承包了一个商店，在我第一次去她那里，我觉得她已经是当时被人们羡慕的万元户了，后来又被大公司聘用，好像是一个部门的经理，常去广州那面联系业务。现在他们都已退休，当上了爷爷、奶奶。他们育有一对儿女。儿子叫杨云峰，大学毕业后在电信部门工作。女儿叫杨婧。

我把母亲和妹妹一起接到了肃北，一起生活了多年。妹妹在我处一方面治疗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慢性病，一方面上学。高中毕业后县上还给安排了工作，后来和县武装部的干事李友田结了婚，生了两个孩子。以后，调到了嘉峪关，现在均已退休。两个孩子都很争气，大的是男孩叫李烨，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。小的是女孩，叫李轶，大学毕业后也考上了美国一所大学，而且有奖学金，相当于拿着工资上学。

关于母亲是如何接到肃北去的，留在以后再谈，这里还是先谈我的童年吧。

小时候，对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太清楚。在我记事的时候，我觉得家境还是比较殷实的。家里有一个铺面，还有一套四匹马拉的大车。虽无自己的住房，租住着山陕同乡会的一套院落，但也感觉就是自己的家园似的。家境虽比不上周围的有钱人，但比穷人就好多了。不但平时有吃有穿，逢年过节还有肉吃有新衣服穿。

我七岁的时候该上小学了。母亲和姐姐给我缝了个书包，由哥哥领我去报了名。